

科技与外交的互动：中国与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关系的考察(1949—1966)

陈璐¹, 张藜^{2*}

1.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 北京 100049

2. 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成立于1946年,是由英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等团体发起的非政府组织,其成员为来自东西方国家的科技工作者团体。自世界科协成立起,中国便是其中重要的一员,经历了世界科协的成立、发展和衰落。通过解析《人民日报》相关报道和有关档案等原始资料,概述了世界科协的发展历程,分析了1949—1966年中国科技界与世界科协关系的发展脉络,讨论了在此期间中国与世界科协之间的相互作用。指出了世界科协是中国接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新中国争取更多国际认同的重要国际平台,而中国政府和科技界是推动世界科协发展壮大的重要力量;参与世界科协系列会议是中国政府通过科技界国际活动为国家外交服务的典型案例,对中国外交工作的开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 科技与外交;世界科协;中国科协;周培源

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世界科协”)成立于1946年。成立之初,世界科协是一个以防止滥用科学成果、维护世界和平以及提高科学家国际地位等为奋斗目标的非政府性质的国际科技组织。1949—1966年,中国科技界积极参加了世界科协相关活动,是世界科协的重要成员。

通过检索相关文献,学界对世界科协的研究较少。国外学者大多将视角聚焦于对世界科协与相关人物、其他国际组织关系的研究^[1-3];还有学者从

冷战背景下世界科协的亲苏立场切入,分析了世界科协陷入危机的原因^[4]。在国内,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刘晓阐述了中国参与世界科协早期活动的发展过程^[5],是现有成果中仅有的以中国与世界科协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文章。刘晓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回顾了鲍威尔与世界科协的关系以及世界科协第十六次执行理事会会议在北京召开的过程^[6]。同时,《中国科学技术协会》^[7]一书回顾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中国科协”)与世界科协的

收稿日期:2021-11-01;修回日期:2022-01-31

基金项目:中国科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课题(2021070504HT070801)

作者简介:陈璐,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科技史,电子信箱:491688298@qq.com;张藜(通信作者),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科技史,电子信箱:lilyzhang109@pku.edu.cn

引用格式:陈璐,张藜.科技与外交的互动:中国与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关系的考察(1949—1966)[J].科技导报,2023,41(10):125-132;doi:10.3981/j.issn.1000-7857.2023.10.012

关系。《科学通报》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刊出过多篇当时参与世界科协系列会议的中国代表所写的会议召开情况以及相关会议信息和会议声明等^[8-12]。

本研究利用相关机构档案、《人民日报》有关报道等资料,通过梳理中国与世界科协之间的关系,深入分析了 1949—1966 年世界科协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所蕴含的外交涵义以及中国对推动世界科协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为当今世界,依然是在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的敌视下展开的中国外交提供些许历史经验与启示。

1 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发展历程

1946 年,世界科协由英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等团体发起,总部设于英国伦敦,由约里奥·居里担任主席。其“最高组织为代表大会。大会休会期的领导机构是执行理事会。执行理事会休会期间,会务由执行局处理。”^[13]世界科协的主要活动形式为召开相关会议,包括世界科协代表大会、执行理事会会议和执行局会议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世界科协是国际上唯一一个包含了来自 2 大不同社会阵营国家科技工作者在内的非政府性质的国际科技组织。

1948 年,在第一届代表大会上,世界科协通过了《科学工作者宪章》,规定了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是“要保持科学的国际性,追究战争的基本原因,支持一切防止战争和建立稳固和平基础的措施,反对歪曲科学的成果作为战争的准备,特别是反对利用科学作大规模屠杀工具,科技工作者有责任保持科技工作的真实性,抗议对科学知识的歪曲或控制,充分发展科学研究的成果”^[13]。由此,世界科协代表大会的议题大多围绕禁止核武器、维护世界和平而展开,与国际政治密切相关。

20 世纪 50 年代,世界科协不断发展。在成立之初,世界科协的成员共有来自英国、法国、中国、美国、日本等东西方国家的 16 个科技组织,会员总数 2.4 万多人^[8]。到了 1956 年,世界科协的会员人数已发展到 15 万余人^[14]。

1952 年,在第十一次执行理事会会议上,世界科协通过了成立欧洲、东亚和南亚区域中心办事处的决议,分别设在布拉格、北京和印度。1953 年,世界科协决定定期出版新闻通讯以便各成员组织相互交换信息、宣传国际科技界的发展情况和及时公开对科学家工作情况的调查进展等,既加强了世界科协成员组织的内部联系,又增加了世界科协的国际影响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际上对科学家境遇的关注。

20 世纪 50 年代末,世界科协内部成员组织出现分裂,而其自身又“缺乏向西方靠拢的能力,无法获得其渴望的影响力。”^[14]同时,另一非政府性质的国际组织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简称“帕格沃什会议”)的兴起对世界科协的发展也造成了一定冲击。这在 1960 年,世界科协名誉秘书、捷克理事马立克给中国物理学家周培源的信函中有所提及:“为了配合帕格沃什会议筹建科学家的国际组织,部分西方科学家和外交人员进行了一系列阻碍世界科协正常发展的行为”^[15]。

再加之,世界科协的相关负责人约里奥·居里等均为左翼科学家,在他们领导下的世界科协是“冷战初期国际左翼科技团体的重要组织”^[6],与苏联关系密切。在冷战的严峻国际形势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世界科协的这一政治立场非常警觉,时常在签证问题上为难世界科协。如:原定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二届代表大会,由于法国政府拒绝给中国和捷克等社会主义国家签发签证,被迫于法国巴黎和捷克布拉格两地举行,严重扰乱了世界科协举办活动的正常秩序。

面对“内忧外患”,世界科协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逐渐走向衰落,甚至一度面临被解散的困境。尽管延续至今,但世界科协的影响力早已大大削弱,鲜有人关注。

2 中国科技界与世界科协关系的发展脉络

“中国不仅是世界科协的创始成员,还在执行理事会中占据重要席位。”^[6]中国著名气象学家涂长

望于1945年倡导成立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协会”)参与了世界科协的创建工作,并且在世界科协正式成立后成为其中一员。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保留了在世界科协中的席位,并对其中代表中国的科技组织做了调整。1950年,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成立,代替中协会加入了世界科协,随即中协会退出了历史舞台。1958年,全国科联与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合并为中国科协。从此,中国科协作为世界科协的中国成员固定下来。

1949—1966年,中国科技界从未缺席世界科协代表大会,且多次派遣代表团参加了执行理事会会议和执行局会议。同时,因世界科协的左翼政治立场,中苏关系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科技界与世界科协的关系。随着中苏关系急转直下,中国科技界与世界科协的关系经历了由紧密联系到出现矛盾从而中断联系的发展历程。

2.1 20世纪50年代—20世纪60年代初期:双方关系不断发展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中国科技界与世界科协的关系持续升温。此一时期,中国科技界是世界科协的重要成员,不但积极参加世界科协的相关活动,在世界科协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中国科技工作者也逐渐增多。除涂长望和钱三强在世界科协成立大会上即成为执行理事成员外,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丁瓚、华罗庚以及周培源等又先后在世界科协的领导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使得中国在世界科协中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得以与世界科协的负责人和各国理事一起参加世界科协领导机构的内部会议,共同讨论世界科协代表大会的议题以及相关决议等,决定世界科协的发展方向,也给中国政府深入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科技工作者的政治主张提供了契机。

与此同时,约里奥·居里、西塞尔·鲍威尔等世界科协领导人大力倡导在中国举办世界科协相关活动,在提高世界科协国际影响力的同时,进一步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科协的距离。

2.2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科协退出世界科协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持续恶化,在世界科协相关活动中也有所体现,且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科技界同世界科协的关系。

1965年10月,第八届世界科协代表大会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此时,中苏两国执政党的关系已经公开破裂,苏联坚持在组织上将“同中国的分裂政策付诸实践”^[16];而中国方面认为苏联正在实行与美国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政策,将苏联排除在反美统一战线之外。由此,在第八届代表大会上,中苏两国代表团产生了尖锐矛盾,且双方在会议过程中将矛盾予以公开化。据中国科协代表团就第八届代表大会召开情况发表的声明显示,会议过程中,在苏联的主导下大会没有讨论中国代表团所提出的决议草案,并且强行通过了苏联和英国代表团提出的与裁军问题相关的决议。在中方代表的视域中“这个决议是一个宣扬战争恐怖、散布‘全面彻底裁军’幻想、彻头彻尾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的决议”^[17]。遂中国代表团当即表示了严重抗议,并声明不为此决议承担任何有关责任。随后,在中国代表团发言时,苏联代表采取了退出会场等手段来阻挠中国代表发言。

在声明中,中国科协代表团认为此次大会“充分暴露了苏联修正主义者假反帝真投降,假支持真出卖的面貌”^[17]。但是,此时中国还暂未放弃与世界科协的联系。因此,中国科协代表团在声明中还号召世界科协各国成员团结起来,共同抵制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者的做法,以及时纠正世界科协的发展方向。

1966年5月,世界科协第二十四次执行局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这次会议讨论了越南抗击美国侵略的相关议题。在此之前,中国党政领导人已经拒绝了勃列日涅夫提出的就越南反美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的提议。因此,在这次会议过程中,中苏代表团在相关问题上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严重分歧。中国科协代表团表示坚决支持越南人民反抗美国侵略的正义斗争并提出了支援越南人民的呼吁书草案。但苏联代表团拒绝讨论中方提出的呼吁书,

而是主张通过筹款、收集科学仪器和药物等方式为越南提供帮助,并且在会议上通过了相关提案,对中国代表团所号召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政策”只字未提。据参会的中国科协代表团负责人表示,该提案并非按照正当程序予以通过。同时,在会议上讨论的其他议题,中苏双方也均未达成一致,苏联代表团依然采取了一些阻碍中国代表团发言的行为。

会议结束后,中国科协代表团负责人认为世界科协已经完全为苏联修正主义所控制,甚至直接认定以苏联为核心的修正主义者正在为“帝国主义充当走卒”^[18]。从此,中国科协退出了世界科协。

2.3 20世纪80年代末—20世纪90年代初期:

中国科协与世界科协恢复联系

自1966年中国科协退出世界科协以后,与其再无直接联系。时隔21年后,1987年,世界科协执行理事会会议在法国夏都召开。正是在这次会议中,世界科协主席提议与中国恢复联系。1990年5月,世界科协秘书长在执行理事会会议上又表示“会很高兴接受中国科协要求恢复会员国地位的申请,并就此事与中国驻英国使馆科技处接触”^[7]。中国科协知悉后,随即派人与世界科协秘书长进行了接洽。1991年1月,中国科协收到了出席世界科协执行理事会会议的邀请。同年6月,中国科协相关领导人致函世界科协秘书长,提出了恢复中国科协在世界科协及其执行理事会会议地位的请求。同年7月,中国科协副主席庄逢甘出席了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五十三次执行理事会会议,标志着中国科协正式恢复了在世界科协中的席位^[7]。

3 世界科协对中国的外交涵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外交孤立下,新中国的外交格局受到了极大地限制。世界科协系列会议的议题大多为当时的国际热点问题,与国际政治联系紧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党政领导人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科技工作者的政治立场和对新中国的看法、间接了解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新中国的态度、宣传新中国的

政治主张提供了契机。由此,出席世界科协系列会议不但是“新中国与西方科学界接触和交往的最早、最重要的窗口,”^[5]也是新中国冲破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外交孤立的重要突破口。正因如此,参与世界科协相关活动被赋予了一定高于其活动本身的外交涵义,中国科技界在参与相关活动之时也大多是带有一定外交任务出席。其中,以周培源最具代表性。

周培源(1902—1993)是中国著名物理学家,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政府、社会机构等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是中国政府信赖且委以重任的科学家之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周培源受中国政府之命多次出席了世界科协系列会议。同时,周培源于1952年被任命为全国科联组织部部长。中国科协成立后,他分别于1958年和1963年担任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和副主席。此外,1955年,周培源当选为世界科协名誉秘书,1962年升任世界科协副主席。可见,无论在世界科协总部还是在其中国成员组织当中,周培源都担任着重要职务,是代表中国政府和科技界参与世界科协相关活动的关键人物。

鉴于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以及世界科协的特殊性,中国政府相关部门通常要为出席世界科协系列会议做充分的会前准备。即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世界科协的内部情况等现实因素预测会议的讨论焦点,在中国总体外交战略的框架内制定出席会议的指导方针等,以便中国代表团从容应对在与会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对中国不利的情况。同时,此一系列会前准备要形成正式文本,通过中国科学院党组等相关部门逐级上报,获得党中央的批示后方可实行。如:1955年,世界科协第四届代表大会于民主德国柏林召开。此次大会的主要议程包括讨论科学家的社会与法律责任、听取各委员会和区域办事处就国际热点问题所做的报告等。赴会前夕,中国科学院党组结合大会议程向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呈送了参会的基本方针:“宣传中国科学在服务于祖国和平建设事业中的发展及其远大前途,说明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中科学事业的显著发展,并表示中国科学家愿意和世界各国科学家合作从事和平建设。对资本主义国

家的科学工作者应在要求和平民主的原则下,积极做好团结工作。”^[19]由上述方针可知,此次中国代表团参会的重要任务有三:一为宣传中国科技事业的建设成就;二为宣传中国的政治主张;三为为新中国争取更多的国际认同。既符合世界科协系列会议的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的官方外交服务。

这些会前准备既是周培源率中国代表团在出席世界科协系列会议期间的指导原则又是他们的重要参会任务。在参会过程中,通过大会发言、参与议题讨论和同与会各国代表私下接触等方式,周培源率中国代表团宣传了中国国内科技建设成果和政治主张,深入了解了与会各国科学家的政治态度、知晓了他们在活动期间的表现及其对中国的看法等。

此外,世界科协的成员同时包含了来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资本主义阵营国家的科技组织。尽管世界科协为亲苏立场,但是部分来自资本主义阵营国家的成员碍于本国政府的政治立场,时常与中国代表团存在矛盾。因此,在世界科协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还要同持有与中国政府不同政治观点的代表作辩论,驳斥有损中国国家利益的言行。如:在周培源呈送中国政府的1960年世界科协第21次执行理事会会议报告中曾提到,一位丹麦代表在会议中公然讨论中国台湾问题,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周培源对此进行了严厉批驳,随后,该丹麦代表向中国代表团表达了歉意。

会议结束后,及时完成会议报告并呈送有关部门也是周培源的重要任务。报告的主要内容在于详细分析各国与会代表的政治背景和对中国的态度、在会议中存在的与中国代表团不同的观点等。以便为中国政府相关部门日后参与国际活动的政治准备提供重要参考,也是中国政府获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关情况的重要途径。

通过世界科协系列活动,中国代表团宣传中国科技建设成就的过程也是树立中国科技界和新中国国际形象的过程;宣传中国政治主张的过程也是为新中国争取更多国际认同的过程。与此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借科技工作者在会议中的言行,与西

方资本主义国家间接进行了对话。无一不推动着中国官方对外关系的开展,为新中国冲破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桎梏开辟了途径。

总体而言,对于中国来说,世界科协不止是一个国际科技组织,更多的是中国政府开展对外关系的重要工具和媒介。中国积极派遣代表团出席世界科协系列活动的目的除参与讨论国际政治之外,还在于为中国的官方外交服务。

4 中国科技界对世界科协的贡献

1949—1966年,在冷战的严峻国际形势下,世界科协的发展一再受阻,中国科技界对世界科协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4.1 第十六次执行理事会会议和世界科协成立十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

早在世界科协成立之初,世界科协相关领导人就认识到了中国对世界科协的重要作用。“为了扩大世界科协在全世界的影响,不局限在欧洲,执行理事会决定1950年的第二次全体大会在中国召开。”^[6]但是,由于部分成员所在国与中国暂无正式外交关系,加之西方国家政府对世界科协的警惕,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直到1955年,在民主德国参加第四届代表大会期间,世界科协副主席鲍威尔和秘书长皮埃尔·毕加向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在中国召开第十六次执行理事会会议的建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培源在请示过中国驻德大使馆以后,表示:“愿回国促成此事。”^[20]代表团归国后即向陈毅副总理等相关领导报告了这一情况并得到了认可。随后,陈毅副总理责成中国科学院向党中央递交了请示报告,最后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批示。

1956年,第十六次执行理事会会议于北京顺利召开,“是世界科协首次在欧洲之外举行活动”^[6]。同时,1956年正值世界科协成立十周年,世界科协有关领导人决定将十周年庆祝大会一并在北京举办。此两个大会在北京召开,意味着世界科协走出了欧洲,扩大了其举办相关活动的地域范围。值得强调的是,会议前后,世界科协主席鲍威尔等来华

参会的科学家在中国共举办了24场学术报告并在中国科学家的陪同下参观了中国相关科研单位和大学,推动了中国科学事业的进步。

4.2 成立世界科协北京区域中心

1952年,在第十一次执行理事会会议上,世界科协主席约里奥·居里提出了成立北京区域中心的建议,因中国方面认为当时的条件尚不成熟而搁置,但成立北京区域中心的计划并未停止。经过中国相关领导人的多次商讨后,在中国科协的帮助和世界科协有关负责人的推动下,1962年,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第二十四次执行理事会会议上通过了成立世界科协北京区域中心的决议。最终,北京区域中心于1963年成立,由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担任主任一职,领导北京区域中心的日常工作。1963年9月25—26日,世界科协北京区域中心成立庆祝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国有关领导人“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以及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21个国家代表出席了庆祝大会。”^[11]

庆祝大会由时任中国科协副主席的周培源主持,他在开幕词中指出了成立世界科协北京区域中心的重要意义。随后张维主任对北京区域中心今后的工作提出了构想,着重提到了北京区域中心的首要工作即是与中国科协合作,积极筹备1964北京科学讨论会。中国科协主席李四光也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除此之外,大会上共有21位外国代表作了发言,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发言中表达了对世界科协北京区域中心的美好祝福和期待。

庆祝大会结束后,世界科协北京区域中心和中国科协联合举办了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筹备大会。在大会上,通过了大会公报,确定了召开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具体日期和会议主题。这一科学讨论会是由世界科协北京区域中心与中国科协联合举办的国际科学会议,是世界科协北京区域中心成立后的首个任务,由中国科协负责大会的组织和会务工作。1964年8月,北京科学讨论会如期召开,“共有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44个国家和地区的367位科学家参加,收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方面的论文299篇”^[12],为世界科协充分

接触亚非拉国家提供了宝贵机遇。

世界科协成立后,其成员绝大多数为来自欧洲国家的科技团体。尤其是在其成立初期,唯一一个来自非洲的南非科技组织在参加了1951年举办的第二届代表大会后退出了世界科协。因此,世界科协在亚非拉国家的影响力极其有限。无疑,在中国的支持下,让世界科协走出了欧洲,扩大了世界科协在亚非拉国家中的影响力,提高了世界科协的国际声誉。

5 结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出于一定外交目的的考虑,中国保留了在世界科协中的席位。此后,中国与世界科协的关系持续发展,成为世界科协的重要成员。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受中苏关系交恶影响,中国科技界最终退出了世界科协。在此期间,世界科协为中国政府和科技界了解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国家科技工作者的政治立场、深入了解其对中国的态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发展情况提供了公开的国际平台。当时,因世界科协正在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所密切关注,世界科协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政府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间接沟通的重要渠道。与此同时,中国积极支持世界科协的发展,使世界科协不再局限于欧洲。并且通过中国自身与亚非拉国家间的友好关系,拉近了世界科协与亚非拉国家的距离。这一过程中,世界科协的中国成员组织中国科协作出了重要贡献。

总体而言,对于中国来说,世界科协是连接着东西方国家的桥梁,参与世界科协系列会议是中国政府通过科技界民间国际活动接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新中国争取更多国际认同的典型代表。而对于世界科协来说,中国是帮助其走出欧洲、提高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推动力。

当今世界,国际格局已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飞速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然而,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鼓吹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国际上对中国采取敌对态度的势力依然存在,尤其是美国坚持对中国战略性施压。对中国与世界科

协关系的历史研究表明,科技界国际活动的开展为官方外交的僵局打开了突破口。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我们应充分认识到科技界外事活动的灵活性,要善于把握和利用科技界外事活动来补足官方外交的不便之处,从而推动本国官方外交工作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Geoffrey R. Science, peace and internationalism: Frédéric Joliot-Curie,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Scientific Worker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ugwash Movement[M]//Alison K, Carola S. Science, peace and communism: The Pugwash Conferences on Science and World Affairs in the early Cold War decades. Leiden, the Netherlands: Brill, 2020: 43-79.
- [2] Petitjean P. The WFSW and UNESCO in the late 1940s [M]//Petitjean P, Zharov V, Glaser G, et al. Sixty years of science at UNESCO 1945-2005. Paris: UNESCO, 2006: 78-80.
- [3] Petitjean P. The joint establishment of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Scientific Workers and of UNESCO after World War II[J]. *Minerva*, 2008, 46(2): 247-270.
- [4] Styles W.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Scientific Workers, a case study of a Soviet Front Organisation: 1946-1964[J].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2017, 13(1): 116-129.
- [5] 刘晓. 中国参与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的早期历程 1945-1950[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9, 41(3): 73-81.
- [6] 刘晓.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1955-1956年西塞尔·鲍威尔教授的亚洲行[J].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16, 37(3): 358-372.
- [7]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M]. 第1版.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 449-461.
- [8] 梁希. 世界科学工作者在团结中前进[J]. *科学通报*, 1951, 2(8): 847-849.
- [9] 涂长望. 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斗争的目标与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成就[J]. *科学通报*, 1953(12): 6-10.
- [10] 赵宗. 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举行第十六届执行理事会和成立十周年纪念会[J]. *科学通报*, 1956(5): 79.
- [11] 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北京中心成立庆祝大会和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筹备会议[J]. *科学通报*, 1963(11): 64-65.
- [12] 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理事会就核子武器所带来的危险发表声明[J]. *科学通报*, 1956(5): 78.
- [13] 新华社. 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介绍[N]. *人民日报*, 1956-04-01(3).
- [14] 关于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J]. *科学通报*, 1956(4): 62-63.
- [15] 关于世界科协寄来有关普格华许会议资料的函[Z]. 北京: 中国科学院档案馆, 1960-04-047-02.
- [16] 谢益显. 中国当代外交史 1949-2001[M]. 第5版.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239.
- [17] 新华社. 我代表团就世界科协第八次代表大会发表声明 谴责苏联代表采取流氓手段破坏会议 坚决反对大会强行通过苏英所提为美帝效劳的决议[N]. *人民日报*, 1965-10-09(4).
- [18] 新华社. 我代表团在世界科协执行局会议上同苏联代表展开尖锐斗争 坚决揭露苏联领导为美帝效劳的叛徒帮凶面目[N]. *人民日报*, 1966-05-07(6).
- [19] 关于科联参加世界科协第四届代表大会的报告(附件) [Z]. 北京: 中国科学院档案馆, 1955-01-031-03.
- [20] 关于参加科联出席世界科协第四届大会周培源等代表回国后的情况汇报(附电报、来信)[Z]. 北京: 中国科学院档案馆, 1956-01-038-01.
- [21] 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J]. *金属学报*, 1964, 7(4): 453-454.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diplomacy: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Scientific Workers (1949–1966)

CHEN Lu¹, ZHANG Li^{2*}

1. School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2.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Scientific Workers, which was founded in 1946, is a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itiated by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of Scientific Workers and other groups. Its members are scientific workers' groups from eastern and western countrie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FSW,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member of it, and has experienced its establishment,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WFSW by analyzing the relevant reports and archives of People's Daily,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WFSW from 1949 to 1966, and discussed in detail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FSW during this period. Then the article pointed out that the WFSW was an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platform for China to contact western capitalist countries and publicize the political stand of New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from 1949 to 1966.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are the important forc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the WFSW. At the same time, participating in a series of meetings of the WFSW is a typical case in whic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erves the country's diplomacy through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of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Besides, it still has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diplomatic work at present.

Keyword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diplomacy; WFSW;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ou Peiyuan ●



(责任编辑 王丽娜)